



什麼是偉大的歷史著作？(下)

文／李弘祺（美國紐約大學城市學院歷史系教授）

我可以斷言，世界上絕對沒有一篇偉大的歷史作品不是用精彩優美的文字寫成的。

運用生動的文字，引起讀者的共鳴

司馬遷文字的美，這是不用說的了。就是《春秋》這本書，雖然它被王安石稱為“斷爛朝報”，但是它的文字在今天看來，仍然十分出色，事實上，我們應該說它就是中國人乃至於東亞各國人的教育，它告訴我們道德是非的觀念。歐陽修就認為最偉大的歷史書不外是《春秋》，而他的標準之一就是《春秋》的文字。相同地，《左傳》雖然有人說它是“相斲書”，但是它敘述完整，文字生動。它對戰爭意義的分析，以及它對道德觀念的發明，都通過璀璨的文字表達出來，吸引著一代代的讀者。它因此成了中國人想像完美的人際關係，或者國邦與國邦之間關係的一本最引人入勝的歷史書。

不過中國文學批評對文字的優美重視的多在於文體，意境和目的，比較少討論文字的邏輯性或可讀性。因此傳統中國史學批評也多重視史家的道德成就和信念（即書法和義例），他的歷史識見，以及寫作的題材，但是比較少重視問題感或文字的表達。因此我們訓練一般學生也通常不重視表達的能力，不重視如何駕馭文字。在西方，情形比較不同。學生從小就學習作文，尤其在英國，老師常常要求學生寫短文，老師逐字修改，

目的是要訓練他們能使用簡潔的文字來表達自己的思想。西方的歷史作品可讀性很高；特別是英國的作家們，他們常常寫傳記，因為傳記所需要處理的事件或史實相對的比較少，可以單線地平鋪直敘，引人入勝。一旦能寫通順的散文，那麼下一步便可以寫更為複雜的歷史。

在西方史學裏，以文字優美而著稱的，第一個人恐怕非凱撒（Caesar）莫屬。凱撒的《高盧戰記》（*Commentaries on the Gallic War*）到了19世紀仍然是學拉丁文的範本。這是因為它的文字鏗鏘有力，簡潔而一針見血。這樣的文字是《高盧戰記》能名垂青史的根本原因。我每次提到凱撒，總不免想到他講的一句名言：“寫作就像一個水手一樣，一定要避免冷僻或少用的生字，就像水手要避免溪流裏的石頭一樣。”這話說得容易，但是反映了一個令出必行，絲毫不苟且，言而有物的大將軍的經驗。無怪乎他的書要成為拉丁文的教科書。

我上面說英國人對寫作特別重視，也因此出了許多富有文采的作家。上面所提到的卡萊爾（Thomas Carlyle）便是一個非常有名的例子。他的作品很多。他又勤於寫作，文字璀璨而華麗，用字高奇，但是不失它的流暢性，這是極為不容易的。一般地說，學者常常提到的是他的《英雄與英雄崇拜》（*Heroes and Hero Worship*）這本書代表了維多利亞時代英國人的自信。或許它不



能說非常忠實地反映了當時英國人的普遍信仰，但是由於它言之有物，文采瑰麗，所以吸引了很多的讀者。說它是偉大的作品，一點也不為過。Carlyle 寫作的速度驚人，他的《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也是一本膾炙人口的名著；據說，他寫這本書就快完工時，突然家裡失火，把他的原稿都燒掉了。他發奮重寫，居然在很短的時間內把那本書再寫了一遍。或許偉大的作品還必須包括勤勞不倦、不畏勞苦寫成的著作吧！

上面所說到的吉朋，他的文華璀璨，據他自己說，當時英國仕女的梳妝檯上都擺了他的書。

另外一位偉大的史家便是 19 世紀住在瑞士巴色（Basel）的一位十分安靜、與塵世隔絕的史家。他就是在 1865 年出版了《意大利文藝復興文化》（*The Culture of the Renaissance in Italy*）的布克哈特（Jakob Burckhardt）。布克哈特是德語區 19 世紀史學的異數。他與蘭克大約同時，但是他不像蘭克那樣強調考證，也不像蘭克那樣，重視宗教的力量。他的關心毋寧是人類的想像力所能創造出來的文明和藝術之美。在這本書裡，他對人性的尊嚴和價值作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就他的文字言之，由於他對美有著一種執著，所以遣詞用字都特別華麗引人。據說讀他的書的人常常廢寢忘食，與他對人類的想像力和創造力的歌頌感到共鳴，而神往不已。當然，布克哈特因為對藝術和文化的美有無限的愛好，因此他對人類不時會破壞它們的那種邪惡的傾向也感到憂心。他因此反而在稱讚人性的尊嚴之餘，對歷史感到悲觀。他固然憧憬人類的自由，但也感到自由如果缺乏意志力的約束，那麼一定會造成破壞。不管如何，文字的美在布克哈特的作品裡，流露無遺。

以當代英語世界的史家言之，夏瑪（Simon Schama）文字的華麗當之無愧。他出身於英國，在劍橋大學發跡，現在轉到美國發展。他的文字以艷美而高奇為特色，用字雖然深奧，卻行文流

暢；一般人或許會覺得不容易讀懂，但是卻富有歷史家少有的那種同情感。他談自然與風景的書好像已經翻譯成為中文。他其他的作品有如《英國史》（*A History of Britain*），《富人的慚愧》（*The Embarrassment of Riches*），《法國革命》（*The French Revolution*）等書也都十分引人。我不敢說他的任何一本書是偉大的作品，但是它們都十分出色，反映了文字的重要性。

當今的美國漢學家當中，以文字取勝的以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為第一。他寫了很多書，文采出眾，不在話下。他的《追尋近代中國》（*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文字簡潔，流暢明白。但是他的作品當中最能令人感到文字的美的應當是《天安門》（*The Gate of Heavenly Peace*）這本書。人們常說，文字帶感情。史景遷的這本書，當之無愧。

當然，《左傳》，《史記》一類的書，他們的文字精彩，不在話下。只是近代中國不太重視文字和修飾，所以我實在舉不出有什麼中文的歷史著作是以文字優美取勝的。半個多世紀前，張蔭麟的《中國古代史》被認為清新流暢，因此大家都說它好。不過這本書好像現在也很少人提了。無論如何，拿它來代表一段時間的出色的作品應該是當之無愧。不過，這裡應當注意到它在史學史上的意義：張蔭麟代表的是當時的理念：不害怕使用新的文字和觀念來敘寫歷史。文字是一個變動不居的工具，學歷史的人應該努力不斷地對歷史按照自己的了解提出新的觀點，用新的語言來表達它們。我常常說，今天我們用“社會流動”這個字眼，不會有什麼人覺得這是什麼怪東西。但是在四十或五十年前，這樣一個詞是很奇突的，因為當時大家還不習慣。其他諸如“另類”、“典範”、或甚至於“生命預期率”，它們好像現在都已經成了中國或台灣史學界常用的字眼了。

總之，一本好的歷史，文章一定優美，能自然地、流暢地而富有情感地表達出作者本人對歷史的認識和體驗。它不一定完全用古人或其他史家的用語，相反地，它能不斷地創新，把作者的想法在流暢而優美的文字裡表達出來，吸引人去接受作者的看法。從這個觀點看來，柏楊的《中國人的歷史》豈非也是一本很好的歷史著作，或甚至於是一本偉大的著作？我如果答“是”，那麼一定要引起風波。但是，在學術的自由市場裡，這麼一本書已經奠定了它一定的地位。它是不是優秀或甚至偉大的歷史書，將來還有經過時間和專業史家的考驗和評價，不過以目前來說，我們也不必一定要說它是一文不值。

我在這裡談到了專業史學家。這個觀念很重要，因為歷史學變成一種專業是 19 世紀才開始的。中國人說文史不分家，這就是說，從前的史學家基本上也是文學家，所以他們充滿了想像力，發明出皇帝和他的臣子秘密講話的內容，用來達到歷史解釋的目的。這在今天絕對是不容許的事，因為近代史學變成了一種專業，把文史徹底分開。專業歷史家反而無法讓他們的想像力奔馳，這是很可惜的地方。他們更發展出一套評定歷史作品好壞的職業標準。下面就討論什麼是專業史學上面的優秀作品。

達成專業史家的標準

如果從專業史學的標準來看，那麼在我看來，布勞德 Fernand Braudel 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The Mediterranean and the Mediterranean World*）最能合乎這標準。這本書，使用的材料之多，可以說是空前，而且整理得有條有理，言而有物。以文字言之，這套大書極為難讀，絕對不吸引人。圖表太多，根本和我們所強調的敘述完全不合。但是它代表的是嚴謹的治學態度和方

法，完全合乎專業史家的標準。更為重要的是他極富創造力，把以前的人所不重視的事實用十分仔細的研究來把它們鋪陳出來，從此人們就了解歷史真正應該重視的不必是王公貴族的實際，而應該重視平常人在每一天的、看似不重要、而且也好像總是不變的起居生活。布勞德這樣的識見是以前所沒有人注意到的，他影響了一整代人，因此它的新“典範”自然占據重要的地位。他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因此是偉大的作品，當之無愧。

麥耐爾（William McNeill）的《疾病與人》（*Plagues and Peoples*）代表的是一種相似的關心。他也帶有深刻的創意，把歷史家對人類歷史本身最基本的關心，和他所體會到的歷史變化的本質作一個非常富有想像力的交代。這本作品強調疾病與人類歷史演化之間的關係。讓人們知道人對自己所生存的客觀環境的控制非常的有限。歷史變化受到自然、環境、疾病的影響十分大。專業的訓練和充滿想像力的眼光使得他能寫出一本優秀、出色的作品。

在近代中國的史學裏，錢穆的《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也是一本十分重要的作品。這本書除了專家之外，很少人會注意他，但是它卻是近代中國學術史上重要的作品，讓我們可以從過去讀經的狹隘眼光當中解放出來，知道中國經學的歷史充滿了造假的過程，爲了要取信於人，常常偽造證據，捏造或割裂經文，漢代的情形就是如此。錢穆的書就能指出這許多的問題，把清代以來中國學者考証的結果做一個總結。讓我們今天可以站在一個更高而更為開放的立場，對中國經學發展的早期歷史有更為可靠的了解。錢穆對古代的史料掌握十分透徹，他的考證能力也是建築在清代以來中國考證學的高峰，因此這本書是開啓新典範的、影響一代人的作品，應該當之無愧。



余英時的《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我認為也達成了專業史學家的境界，而且富有創意，絕對是一本優秀的作品。我認為他的重要性要過於最近出版的《朱熹的歷史世界》。為甚麼這麼說？這是因為余英時的這本書比起他的《朱熹的歷史世界》更富有創意，後者固然是要建立一個在歷史脈絡裡的朱熹，把朱熹當作是一個典型的知識份子，用他的時代來襯托出他的思想，但是畢竟知識份子的努力本來就是中國近百年來思想史的主要典範，余英時把朱熹拿來做知識份子的代表，這當然不錯，卻畢竟算不得開拓一個新的方向。因此從嚴謹的史學的方法論和視野來看這本論朱熹的書，可以認為它比不上《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20世紀對中國歷史學言之，是一個花果飄零、令人鄉愁的世紀。中國正史的傳統已經完全斷絕，現在不會再有人說要寫一部像20世紀初年的《清史稿》那樣的正史了，甚至於連紀傳體的著作現在也已經被徹底地揚棄。20世紀的中國人一般採用的史體都是屬於西方傳進來的散文體，以編年的紀事本末方式來寫作。就方法言之，也一定要根據一套邏輯上能站得住腳的方法論或觀點。因此可以說，如果有人用傳統的觀點和文體來著述，那麼他大約無法引起什麼人的注意，更難希望得到人家的重視。但是，如果能兼傳統和現代的長處，把握大量的資料，並用系統的眼光來考量和分析這些資料所傳達的信息，那麼，他一定可以寫出重要的著作。陳寅恪的《隋唐制度淵源略論攷》、《唐代政治史述論稿》可以說是達到了這樣的標準。它們對唐代貴族勢力的分野的闡述，以及新進士與舊世族之間的鬥爭的解釋發前人所未發，支配了近代中國史學觀點數十年，說它們是偉大的作品，一點也不為過。

言筆至此，想起了莫米格理雅諾（Arnaldo

Momigliano）對吉朋的解釋。他說吉朋的史學方法是建築在17世紀歐洲的通儒重視博學的理想以及18世紀啓蒙思想重視分析的學風上面，綜合兩者的長處，遂使他能寫出這麼一本重要的歷史巨著。陳寅恪何嘗不是如此。當然，20世紀初的羅振玉、王國維、章太炎以及陳垣也都是能在中西學術交流剛開始的時候把握舊根底，開創新視野，而發明前人所不及見的議論。順便說一下，20世紀中國還有許多重要的歷史著作，過去我們在台灣加以排斥，這是很不幸的事。為了公平起見，我或許應該說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應當算是一本在台灣沒有人重視的重要的、極為優秀的歷史著作吧。只是我們必須承認，並非所有偉大的著作都會在世界各地受到相等的對待或重視的。下面我們說到後現代主義的影響時，大家就可以了解這一點。

在西方，近數十年來真正可以說得上是偉大的歷史作品的，除了上面所提到的布勞德的《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和麥耐爾的《疾病與人》以外，很難再提出其他的著作。布勞德另外寫有《資本主義與文明》三大冊的巨著。這套書翻譯成爲英文出版時，美國的《新聞周刊》還特地用了兩頁的篇幅來介紹他，盛況空前。但是從長遠的影響言之，我相信這三冊書的重要性不可能超過《地中海與地中海世界》。麥耐爾真正成名的著作其實是《西方的興起》（The Rise of the West），這本書是現代化信仰達到高峰時的作品，代表了西方進步觀念最後的衝刺，從今天的觀點看來，這樣的書已經不能再取信於人了。但是他的《疾病與人》卻替史學研究開創了一條前所未有的新途徑，因此這本書將會流傳長久。

論者或許要問：史賓格勒（Oswald Spengler）和湯恩比（Arnold J. Toynbee）呢？以目前言之，這兩位史家的聲譽可以說是跌到了谷底。他們因

爲在治學上面不太做第一手資料的探討和考證，只是借用別人已經研究過的成果，來闡發自己的看法，因此許多嚴謹的史家都不喜歡他們，認爲他們是先有一套看法，然後才把史料套進去證明，違反了歷史學最基本求真的原則。但是在我看來，由於世界局勢最近有了重大的改變，因此一定會再有人重新談這兩個人。

從這裡我們還可以反省許多探討歷史本質和歷史知識如何可能的著作。我認爲 20 世紀最重要的、談論歷史學的寫作模式的、恐怕不能不說是懷特（Hayden White）的《形上歷史學》（*Metahistory*，又譯爲《後設歷史學》、《史元》）。我認爲這本書的影響至少和孔恩（Thomas Kuhn）的《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一樣的深遠。20 世紀的史學史，嚴格言之，是一片空白。當然，許多學者對進步的觀念提出批判，提出了各樣的疑慮，再加上受到德國歷史主義的影響，於是產生了像美國的畢爾德（Charles Beard），貝克（Carl Becker）、意大利的克羅齊（Benedetto Croce），以及英國的科林吾（R. G. Collingwood）一類的史學家。他們都同聲否定歷史有完美或終極的答案。不過這些人的著作沒有一本比得上懷特的《形上歷史學》。

從今天台灣的立場來看整個世界的歷史寫作，那麼，我們應當說，日本的歷史界的名著被我們完全忽視了，就好像我們不知道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樣。影響了上一代台灣知識分子十分深遠的矢內原忠雄的《日本帝國主義下的台灣》一書，現在知道的人也很少。它作爲一本偉大的著作是當之無愧的。它的重要性乃是因爲作者在當年的氣氛之下，能本著基督徒的良心，勇敢地出來反對日本發動對華戰爭，這是極爲不容易的。他這本書在學術上以深刻的見解，有條

理而系統的理论和研究，來對帝國主義在台灣採行的剝削政策作嚴苛的批判。無怪乎吸引了許多台灣的留學生，對他崇拜有加。矢內原忠雄後來因爲言論不能見容於當時的軍國政府，被趕出了東京大學。戰後，他回到東大復職，還當了東大的總長。一本偉大的著作一定要建築在深厚的學術基礎上面，但就他這本書言之，更是因爲它代表了人類的良心。近代日本史學界的著作有很多是十分重要、或甚至於是偉大的，可惜我們知道得太少。馬克思主義的影響在日本就十分深遠。至少有一個人應該在這裡被提到：仁井田陞。他的《唐令拾遺補》以及《中國法制史研究》都是建築在他對馬克思史學方法的徹底了解上面。它們對後代治中國法制史學者的影響，到目前爲止還沒有出其右者。進一步說，這些書也都是嚴謹的史學作品，代表的是最細膩的史學寫作的手法，雖然將來一定會被其他更仔細的著作超過，但是仁井田所開啓的典範和途徑影響了一整代的學者，因此絕對是偉大的史家。

結論：偉大的歷史作品與優秀的歷史作品

現代世界的思想十分紛擾，令人覺得莫衷一是，後現代的思維更加強了這樣的危機感。19 世紀以來發展出來的史學規範已經被挑戰得體無完膚，因此不僅各文化或國家對於什麼是好的歷史作品或好的史學寫作的方法，看法有嚴重的歧異，甚至於在一個國家裏，不同的人對歷史作品的評價也可以有天壤之別，因此我們在這個時候來談什麼是當前站在台灣的立場可以稱之爲偉大的歷史作品，似乎不切實際。19 世紀是民族主義興起的時代，再加上西方文明夾帶它近代化的成就，成了世界上人人都欽羨、模仿的對象，因此西方的標準就成了其他地區的標準。歷史學也是如此，西方的模式就是世界各國跟隨的對象。好



壞似乎還有一定的規律可循。但是，到了後現代主義的時代，這樣的標準已經被打破，造成了百家爭鳴的局面。20世紀可以稱之為偉大的作品的到現在還很難說得出來。上面所提到的，大多是20世紀以前的著作。我雖然試著也討論20世紀，但都是我個人的見解。不過，偉大的歷史作品是不會受到後現代主義的束縛的。它們終會脫繭而出。歷史上許多偉大的作品，它們在作者在世的時候，往往受不到重視。偉大的作品是人們在生命的饗宴和命運的折磨中提煉出來的，它們必須像一道文火慢燉的佳肴，讓人們細細地品嚐，而慢慢地發現他們咀嚼的是天下的美食。它們表達的一定是人們內心最深處的體驗，用最生動、翔實的文字，像嘆息一般，輕盈地、述說那哀艷的故事。當然，史家駕馭文字，就必須也能把人性的尊嚴、人必須活下去的意志力清楚而堅強地表現出來。這樣的文字一定鏗鏘有力、擲地有聲，不斷地震撼人心，鼓舞後人。希伯來聖經的許多歷史故事，就像中國的《左傳》一樣，處處表現出道德的力量、以及人在命運的折磨下所表現出來對道德信念和人性尊嚴的信心。

現代歷史學是大學學科裏的一支，其訓練往往反而妨礙學者的想像力，使得他們創作的原動力受到了壓抑。專業的史家寫出了許多優秀的歷史作品，但是偉大的歷史作品，其寫作的靈感和技術往往不是由訓練而來。除了能感受到時代的呼喚，能忠實而細膩地表達出共同體的喜怒哀樂和靈魂深處的呼喊之外，他的作品還必須能引領我們知道人類的前程，幫助人類規劃他們往前去的走向。它一定能經得起時間洪流的沖刷，歷久而常新。這纔是偉大的作品。偉大和優秀之間，畢竟還是有一個區別的：優秀的作品很多，但是偉大的作品是人類文明的精華，不是常常出現的。

(2004年12月21日於台大) 

對〈懷念彭九生教授〉一文之回應

文／林紹文（1969 機械系畢業）

我感到很驚喜，能拜讀陳雍學兄的〈懷念彭九生教授〉一文。在此我想補充一些有關於彭教授的事跡。

彭老師教學認真，對我們學生的提攜更是不遺餘力。他當年教我們大二（1966~1967）的熱力學。熱力學在機械工程是一門很重要的基礎課程，是一門兩學期，一學期四學分的重課。我們在大學，幾乎沒有一個教授真正能把一本書教完。彭老師的熱力學也不例外。可是他為了我們能學到更完整的熱力學，叫我們在期末考過後回校補課一星期。我們對彭教授諄諄教誨的精神感到由衷的敬佩和感激。在上完他的補課之後，我和同學們都回家過暑假，我也回南部去。大約在1967年的8月中，同班同學楊日同兄來我家找我去爬家鄉附近的小山。他說彭九生教授已在上個月辭世，他的消息是來自其他同學。當時我聽到這個噩耗，在錯愕之餘，我為彭教授感到哀悼和惋惜。開學後我聽機械系師生都說彭教授為我們這班同學鞠躬盡瘁，奉獻了他生命的最後時刻。彭老師過世後，熱力學一課改由林光中教授授課，時間是1967年秋。

陳雍學兄在1967年夏畢業，比我早兩屆。依當時政府的政策，所有的大學畢業生，男生都要服一年的預備軍官役，之後才能就業或出國留學。因此，男生最快也要在服役那年，才能申請美國大學的入學許可和獎學金。陳兄在文中有這樣一段話：『畢業後申請留學，也沒敢請彭老寫介紹信，大牌教授的推薦書一般都是高成績同學的專利。出國後，異域兩隔，不說相見無期，心想往後恐怕也扯不上關係。』言下頗有遺憾之意。他萬萬沒有料想到，其實彭教授當時已不在人世。我相信陳兄那時剛畢業，離開學校進入軍中服役。而當時台灣的通訊設備不如今日之發達，消息傳遞不易。這也難怪他對彭教授的去世一事無所聽聞。我在此補充這一段，一則以釋陳兄之懷，二則也表示我對彭老師的追念。 